



世纪前沿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4,
Globalizations, 1945-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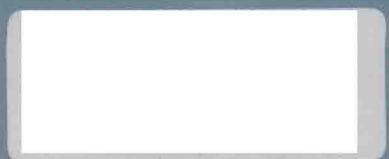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郭忠华 徐法寅 蒋文芳 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四卷)
全球化 (1945-2011)
上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四卷)

全球化

(1945—2011)

上

[英] 迈克尔·曼 著 郭忠华 徐法寅 蒋文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中文版序言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第四卷将我对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考察带向终点。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760年到1914年，内容具有很强的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一时期的各种帝国。我因此从第三卷开始关注现代帝国，并且不得不在开头部分回溯很长一段时间，详细讨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帝国。然后，第三卷所叙述的故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作为结束。为写作第三、四卷，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远未达到全面和彻底的程度，因为有关现代时期的相关资料已达到极其丰富的程度。如果我的叙述引用了什么错误的史料，或者借鉴了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或采纳了一个可能具有高度有争议的观点，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最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是有关东亚的章节，因为我无法阅读中文和日文的文献。

但我的叙述不仅仅是经验性质的，毋宁说是依据社会学理论构建起来的，这些理论模型从我调查的大量经验数据中提炼而来。我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与前面两卷一样，我的叙述结构主要依赖于四种相互作用的权力来源，其中每一种来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这四种来源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那些能够行使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生产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国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会权力。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是“马克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有时也使用一种三重分层模

型，即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一标签有些道理，并且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与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我不赞同韦伯的是，包括现代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许多依赖于其他大国提供保护的现代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那些国家的军事权力也没有有效地渗透在自己的领土上。更为晚近的例子是当代“软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军事权力比其在世界经济和环境等“软”问题上行使的权力要少得多。中国从某种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组织化的致命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家的机构和法律(政治权力)。我相信，我是唯一把历史和社会看作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来加以分析的理论家。

尽管所有四种来源常常互相绞合在一起，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所以彼此之间最终是一种“正交”(orthogonal)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约为另一方。因此，我尽管在第三、四卷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不论这种观点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我尽管承认意识形态在这些时期的重要性，我坚持拒绝唯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所谓“文化转向”中非常普遍。在军事权力方面，我纠正学术界常常忽视这一方面独立性的相反趋势，直到最近 20 多年，战争和武装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视。我认为，晚近对于军事权力不断增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对我的影响。对于政治权力，我强调民族国家将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断强化的“牢笼”观点。我在这两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种来源所构成的权力网络在现代时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时也强调，重大社会制度是由这四种权力来源所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这一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主要权力制度的发展。

这不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简洁、普遍解释的“硬”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并非简单明了，毋宁说它们极为凌乱，但我的确希望提

出一种通常所谓的“中层”理论。当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这一点，那就必须阅读这两卷，你会在其中发现帝国主义兴起的理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包括大萧条的灾难)的理论、福利国家兴起的理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 20 世纪恐怖战争的理论。

在这两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说的“权力的前锋”，即关注每一时期权力最大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起源对于后来如何成为强国极为重要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关注欧洲和美国，而对衰落中的中国只是简单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则很大的不同，它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关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随后导致其崩溃的战争，讨论了两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受尽凌辱的中国和沦为殖民地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成为了强国。就中国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国的不完全复兴进程，这一进程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所突然中断。对于日本，我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曾经倡导过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主张。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发展成为高度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地方军阀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卷的前面章节，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包括东亚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关革命的讨论在第四卷“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一章中将达到高潮。当然，我在第四卷还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

我很高兴我的许多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国的演讲，并且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繁荣。作为西方人，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中国为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希望本书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绵薄之力。

迈克尔·曼

2014 年 10 月 21 日

社会权力的来源

上

目录

中文版序言/1

第一章 诸种全球化/1

第二章 战后的全球秩序/16

第三章 1945—1970年战争和冷战中的美国：阶级冲突/49

第四章 美国的公民权利与认同斗争/90

第五章 冷战中的美帝国：1945—1980/116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衰落：1970—2000/167

第七章 苏联方案的失败/229

第八章 毛泽东主义方案的改革/278

第一章

诸种全球化

我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史研究的第四卷，也即最后一卷，将涵盖 1945 年以来的历史。本卷将聚焦于战后全球秩序的三大主要支柱：资本主义（以及苏联的命运和中国的转型）、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作为世界仅存帝国的美国。这一时期所有这三大支柱的最明显特征莫过于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一个被广泛称作全球化的过程。我在第三卷中用复数的形式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以此表明正在行进的全球化不止一个过程。我在所有四卷著作中始终强调，人类社会是围绕着四种独特的权力资源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四种资源之间彼此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我所说的权力的 IEMP 模型）。但它们是一些理想类型的权力资源，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其纯粹的形式，它们围绕着社会的三大主要宏观制度而集结在一起，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帝国。这一时期主要的新型意识形态都是围绕人类试图理解那三大宏观制度而形成的。

让我首先对这四种权力资源做一个简短介绍吧，更为详细的阐述可见之于所有前三卷的第一章。权力就是使他人去做即使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为达到这一目标，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与他人进入到一种彼此合作和冲突的权力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催生了社会。因此，权力既可能是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聚合性关系——通过他人而形成的权力(power through others)，也可能是分配性的关系，即通过某些人支配其他人而形成的权力。两种权力都存在四种主要来源：

(1) 意识形态的权力来源于人类寻找生命终极意义的需要，来源于与他人分享规范与价值以及参与审美和仪式实践的需要。意识形态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其运动的力量则来源于我们无力在我们的所知世界中达到确定性。我们在各种隔阂和不确定性之间注入形形色色的信仰，这些信仰本身并不能被科学地证明，但却表征了我们怀有的希望和恐惧。没有人可以证明是否存在上帝，抑或可以证明人类将走向社会主义或者伊斯兰主义的未来。在旧的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不再有效、新的意识形态又尚未形成效力的危机关头，意识形态变得尤为必须。在这一时期，我们最易受意识形态理论家的权力之影响，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某种似是而非而又无法证明的有关这个世界的理论。意识形态权力总体上是对其他三种权力源泉之发展的反应，但随后形成自身的特有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很不均匀，当我们需要解决没有预期到的危机的时候，它猛然变得重要，但在其他一些时候则通常不那么重要。在这一时期，与父权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环保主义等世俗意识形态一样，复兴的宗教意义体系也占有一席之地。

(2) 经济权力来源于人类提取、转化、分配和消费自然产品的需要。经济关系之所以强大有力，在于它将劳动力的集中动员与更广泛的交换网络联系在一起。当代资本主义把整个地球作为资本、贸易和生产链的竞技场，其权力关系同时渗透在绝大多数人最例行化的日常生活中，侵占了我们至少一半的清醒状态时间。与军事权力不同，各种经济生产的社会变迁很少是迅速的或者突变式的，毋宁说它们是缓慢的、累积性的，但最终影响深远。现代阶段经济权力的最主要组织形式是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构成了本卷论述的核心。资本主义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工具都转化成为商品，包括资本、劳动力、产品和消费在内的所有四种主要市场彼此进行贸易竞争。晚近以来，资本主义已成为最为持久和有利的权力组织，它造就了大部分的技术革新和环境蜕化。

(3) 军事权力。我把军事权力界定为这样一种社会组织——集中而毁灭性的暴力。“集中”意味着动员(mobilized)和聚焦(focused)，“毁灭”则意味着“致命”(deadly)。《韦伯斯特大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把“暴力”界定为为达到伤害或者虐待(abuse)的目的而使用武力，通常表现为一种剧烈、残暴、疯狂和毁灭性的行为或者力量。军事权力因此是集中的、有形的、剧烈的和致命的，它生杀大权予夺，如果你敢于抵抗，军事暴力的持有者就会说：你该死。由于致命的威胁是令人极度恐惧的，军事权力因此催生恐惧等某些特殊的心理情感和心里征兆，就像我们将面临疼痛、肢解和死亡等情形时那样。军事权力通常为武装部队在国家间战争的状态下所致命地使用，尽管本卷同时还将讨论准军事组织、民兵以及恐怖主义等力量。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存在着明显的交合之处，尽管它们通常表现为不同的组织形式、体现为社会中不同的等级。

(4) 政治权力体现为对社会生活的集中和领土化管理。政治的基本职能在于在特定的领土范畴内提供秩序。我这里不仅从韦伯那里获得灵感，他把政治权力(或者“派系”)归属于各种类型的组织，而不仅仅是国家，而且从诸多政治科学家的治理概念那里获得灵感，他们把治理看作是由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NGO)和社会运动在内的不同团体所实施的活动。我倾向于把包括地方、地区以及全国层级的政府在内的国家看作是“政治”的，因为只有国家才具有集权—领土化的形式，可以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个人制定权威性规则，其他非政府组织(NGO)或者企业都不具有此种形式。我可以从某个 NGO 或者企业中辞职，并因此藐视其规则，但我必须遵守我所居住国家的规则，否则将招致惩罚。政治权力网络通常以集权化和领土化的方式得到管理和协调，与其他三种权力资源相比，政治权力因此更加地域化，国家所涵盖的范围通常比意识形态更小、更加紧密。

因此，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涉及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之间的独特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伸延。具体地说，1945年之后，全球化意味

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传播,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意味着军事打击范围的延伸,意味着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一开始具有两个帝国,后来则只剩下一个。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大部分有关全球化的讨论都令人兴味索然,除范围之外,全球化并不具有特殊的意涵,除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一点之外,全球化不会做任何事情。全球化自身不能由于人类社会的某种状态而受到赞扬或者指责,因为它仅仅是社会权力资源扩张的结果。这一点也反映在全球化没有催生有关社会的创新性理论这一点上。社会科学家以前提出的理论主张,社会与民族—国家相同,现在它们已在地域范围上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这一点通常为某些沽名钓誉的社会科学家所主张的社会已发生根本性转型观点所掩盖。极端全球化者主张,全球化已导致根本不同的社会类型。以一种稍带轻蔑的口吻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看作是全球化的胡说(globaloney)。然而,全球化的某一个维度的确是转型性的:那就是人类行动扩张至全球,然后又返回到我们自身。这是一种回龙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即人类行动撞击到地球的极限,然后它们又反过来重重地撞击着行动者自身,并使他们发生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可能以两种方式发生。方式之一是战争的武器已经发展得如此致命,以致核战争或者生物武器战争可能摧毁整个人类文明。就如我在第二章将要谈到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这样一种威胁之下。方式之二尽管还不那么具体,但却已可预测:以燃烧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经济扩张提高了有害排放,这一点也可能使人类文明最终难以为继,这一问题我将在第十二章加以讨论。马克思主义者预测了第三种可能的回龙镖效应,那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最终将遍及全球,这将使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再可能,并由此形成重大危机。但倘若要分析这些可能的前景,我们就必须从经济和军事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赋予全球化内涵,是它们形成了回龙镖效应,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赋予全球化内涵的最流行方式莫过于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其基本驱动

力。唯物主义者把全球化看作是由资本获利的经济压力所驱动，这一压力导致了使生产链和市场能够全球扩展的通讯技术革命。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现在只有中国仍对全球化半推半就(我将在第八章对这一点加以讨论)。经济学家有时以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或者商品价格的全球趋同度(有时还加上劳动力迁移的指数)来衡量全球化水平。通过这些指数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全球化在17—19世纪早期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但1860—1914年间突然高涨，紧接着是一个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萧条与战争相混杂的滞涨时期，一直到1960年才出现复苏和第二轮高涨(O'Rourke & Williamson, 1999)。正是第二个高涨阶段催生了我们当今最为全球性的经济。既然现在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和移民指数只比1914年之前的那一段时期稍高，情况说明，实体经济中的绝大部分不能仅通过统计数据来得到衡量或者计算——尽管国际贸易额的确容易得到测量——因为所得比例(resulting ratio)总是会呈向上偏误(biased upward)。在第二个高涨周期，金融资本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即时性地流动，同时，生产链也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延伸。所有这些将在第六和第十一章加以讨论。

经济学家通常把全球化界定为市场的全球整合，这种观点忽略了战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其他主要推动力。他们还暗示，全球化只发生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但正如本卷将要表明的，衰退时期同样存在全球化。人们通常把1914—1945时期当作全球化衰退的阶段，而且那一时期确实存在国际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我承认那一时期的经济整合出现了下降，经济分裂变得全球化了。但那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同时还存在着我们所说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几乎使全世界所有国家无一幸免的大萧条。这是一个分裂的全球化阶段(disintegrating globalization)。与此类似，1970年代以来的停滞导致了各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但这些政策又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大衰退。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更加全球性的经济危

机——气候变化。增长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与此同时，危机也越来越变得全球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增长抑或衰退的故事，因为每一个人类成功的故事都伴随着严重的问题，每一次重大灾难中也都隐含着一线生机。经济增长破坏了环境、耗尽了自然资源，而每一次世界大战却都催生了更多的公民权。

全球扩张还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意义一点都不会比全球化少。晚近 19 世纪的高涨将北欧、西欧及其殖民地整合成大西洋经济，同时强化了它们与世界其余地方的差别。1960 年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涨将南欧、东亚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地方——但不包括非洲和中亚——整合在了一起。我们在总结全球化的时候不能不顾其地区差异或者其准确的时间性，全球化在何时、何地得到扩张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经济学家总是企图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FP)来分析全球经济扩张，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被拆分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力，以及分配给技术创新的余额。不幸的是，这种余额总是非常庞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我们仍然缺乏的技术变化来对增长做出解释。经济史学家将 19 世纪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缩小为交通技术(包括铁路，尤其是航运)，把 20 世纪早期的技术创新缩小为适用于诸多工业部门的普遍应用性技术，如电力、内燃机等。在第二个增长阶段，他们强调微电子技术和微生物技术。他们还强调，技术的后期普及比其初始发明更加重要。但对于发明和普及的解释使经济学家偏离了惯常的分析变量而进入到普遍性的社会制度。以一战后的经济滞胀为例，那一时期技术并没有丧失，通讯技术的确仍在发展。但经济学家却说道，那一时期出现了对银行和货币运转调控不足的政治制度失败，太喜欢求助于保护性政策。与此相反，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他们又说道，那一时期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更加良好的政府政策和更加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新型的技术。即使在后来网络技术、微电子技术和微生物技术产品出现之后，极端全球化者仍然认为它们没有带来多大的增长。经济学家现在仍然在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并希望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